

A STUD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本科翻译教学研究

彭 萍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科翻译教学研究



A STUD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彭 萍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科翻译教学研究 / 彭萍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17-2532-5

- I. ①本…
- II. ①彭…
- III. ①翻译—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 IV. ① H05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7521 号

本科翻译教学研究

出版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苗永姝
特邀编辑: 郑颖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274千字
印张: 20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65.00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网店: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55626985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1
二、新时期翻译教学的重要意义.....	12
三、国内本科翻译教学现状.....	16
四、国内外翻译教学研究的现状.....	20
五、本书结构和研究方法.....	30
第二章 本科翻译教学的目标和翻译实践教学的可行性.....	32
第一节 本科翻译教学的目标.....	32
第二节 从规定性和描写性看翻译实践教学的可行性.....	35
一、从规定性看翻译教学的可行性.....	38
二、从描写性看翻译教学的可行性.....	50
第三章 翻译教师队伍的现状及其职业发展的途径.....	53
第一节 翻译教师队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54
一、师资不足.....	55
二、师资队伍良莠不齐.....	57
三、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脱节.....	60
四、对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认识不足.....	63
第二节 翻译教师职业发展的途径.....	64
一、各方都应对翻译教学表现出高度的重视.....	65
二、翻译教师要重视提高自己的实践技能.....	67

三、翻译教师应重视教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71

四、翻译教师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73

第四章 翻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现状、

学习效果调查与分析.....77

第一节 翻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调查与分析.....78

第二节 翻译学习者的学习现状调查与分析.....83

一、对翻译学习的认识.....84

二、翻译学习的现状.....93

第三节 翻译学习效果调查与分析.....104

第五章 本科翻译教材和翻译教学内容.....112

第一节 翻译教材的真正定位.....112

第二节 翻译教学的内容.....120

一、中国翻译史简介.....121

二、两种语言和文化对比及翻译策略与技巧.....122

三、文体特点及其翻译策略与技巧.....126

四、译文评析.....130

第六章 双语互译教学同步进行的科学性.....133

第一节 从词义对比看双语互译教学同步进行的科学性.....133

第二节 从句式结构对比看双语互译教学同步进行的科学性..137

第三节 从文体特点对比看英汉互译教学同步进行的科学性..142

第七章 翻译教学中的人文通识教育.....147

第一节 人文通识教育概述.....147

第二节 翻译教学中人文通识教育的途径.....151

一、中国翻译简史拓展翻译学习者的历史知识与文化视野...151

二、翻译选材和翻译具体操作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心理 素质及美学素养.....	153
三、译文评析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156
第八章 翻译作业和翻译测试.....	161
第一节 翻译作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61
第二节 翻译作业的形式及其评价方法与机制.....	165
一、“有声思维”教学和微型“翻译工作坊” ——小组讨论型翻译作业.....	167
二、个体课外自主学习 ——课下完成后课堂展示的作业及上交的作业.....	177
三、翻译作业的评价标准.....	179
第三节 翻译测试.....	189
一、翻译测试概说.....	189
二、翻译测试的目的.....	193
三、翻译测试的形式和内容.....	195
四、翻译测试评分标准和效度.....	202
五、翻译测试结果分析和翻译题库建设.....	206
第九章 翻译教学的微观透视 ——语言、文化及语篇与翻译教学.....	208
第一节 语言和认知模式与翻译教学.....	210
一、语言、认知模式与翻译之间的关系简析.....	211
二、认知模式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214
第二节 翻译中语言与文化的语际负迁移及其教学对策.....	217
一、翻译中的句法语际负迁移及其教学对策.....	219
二、翻译中的语义负迁移及其教学对策.....	223
三、翻译中的文化负迁移及其教学对策.....	226



第三节 语内翻译在语际翻译中的重要性及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230
一、从词和短语的层面看语内翻译在语际翻译中的重要性及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231
二、从句式结构层面看语内翻译在语际翻译中的重要性及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235
三、从文化层面看语内翻译在语际翻译中的重要性及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238
第四节 语篇语境认知与翻译教学	241
一、翻译中语篇语境认知的重要性	242
二、语篇语境认知与翻译教学	244
第十章 专门用途英语 (ESP) 翻译教学	257
一、ESP 翻译教学与普通翻译教学的关系	258
二、翻译教学的原则	260
三、ESP 翻译教学的内容	262
四、ESP 翻译教师的素质	264
第十一章 思考与展望——以翻译教学的生态哲学视角为例	268
第一节 生态哲学和生态教育学概述	268
第二节 翻译教学的生态哲学视角：思考与展望	275
一、翻译教学与自然	275
二、翻译教学与社会	277
三、翻译教学中的自身与他人	279
四、翻译教学中的自身发展	287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9

第一章 导 言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一) 中国翻译人才培养的历史传统

中国内部各民族的交往史以及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史都是一部翻译史。据马祖毅先生考证,中国较早关于翻译官职的记载见于《周礼》和《礼记》。^①《周礼·秋官》中记载有:“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所谓“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可见,《秋官》中的“象胥”就是“译员”之意。《礼记》则对负责东南西北四方的翻译人员给予了不同的称呼:“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在当时,“象胥”又称舌人。“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职也。”(《礼记·王制》)后来翻译者之所以称为“译”,赞宁《译经篇》是这样解释的:“今四方之民,译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至于“翻译”二字连用,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但意思尚不清楚。^②在赞宁的《译经篇》中零星可见“翻”和“译”二字并用的现象,如“二非句,即赍经三藏虽兼胡语,到此不翻译者是。”^③但不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3页。

②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③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管称呼如何,各民族之间、各国之间一旦出现交流,就必定会有翻译的出现,这在中国也毫不例外。尤其是公元一世纪左右开始的佛典汉译更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翻译的新篇章。

据历史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已经听说了佛典,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佛典的翻译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发展(以道安和鸠摩罗什为代表),到隋唐时期(以玄奘为代表)达到顶峰。值得一提的是佛典翻译时期的译场,因为“译场”不仅是佛典翻译的组织,还堪称通过翻译佛典培训翻译人员的重要机构。东晋时期,前秦苻坚开始大规模组织翻译佛经,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当时的官方主持人是秘书郎赵政,释道安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①后秦姚兴迎鸠摩罗什至长安,礼为国师并请他在逍遥园主持译场,据说当时译场聚集了八百名僧,徒众三千人。鸠摩罗什主持的译场中分工已经相当详细和明确,主要包括:口译、传语、笔受、校勘(校勘工作初由通华文的主译或传语负责,后来另归专人,译文的用字在检校时才作最后决定)。当时的译场中,对每一部佛典最后译文的确定都要经过热烈的讨论,都经过字斟句酌,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僧人无形中学习了整个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的技巧,因此不可否认,这一译场对翻译培训起到了潜在的重要作用。到了唐代,译场的分工更加明细,有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唄、监护大使等,多达11种。这些僧人在精通梵汉、深晓佛理的主译领导下,研讨梵经义理,每出一书,皆多数人协力分工之结果。这种完备的翻译组织,使玄奘主持的译场在十九年中译出佛经一千三百余卷。所以有人说,佛经译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和“研究所”。^②正是有了“译场”这种类似教育和研究机构的翻译机构的存在,才为中国本土培养了很多僧人,从而使更多的僧人能够投入到佛典翻译工作中去,为佛典在中国乃至东亚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6页。

② 王雷泉、程群:《中国佛教译场的回顾与前瞻》, <http://www.chinawts.com/list/budstore6/191641693.htm>, (2013年6月1日访问。)

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最早正式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出现在明朝，那就是当时的四夷馆。早在明朝初年，中国与邻邦外蕃及海外国家的交往已经非常频繁，于是口笔译方面的人才奇缺，所以不得不设立专门的培训学校培养翻译人才，四夷馆便应运而生。学生在四夷馆中可以学习蒙古、西藏、印度、缅甸、暹罗等地区和国家的语言，毕业后分配到各部充当译员，包括口译和笔译。明成祖之前这些译员不受重视，可是到明成祖统治时期，翻译人员的身份得到提高，准许他们在开科时就试，可以中进士。当然，总体看来，当时四夷馆中的学生待遇时高时低，但无论如何，从四夷馆学生的待遇可以看出，翻译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也是紧迫的任务，尤其是汉族同外族交往密切的时候。明朝的四夷馆也为明朝各个时期的外交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商务往来和文化交往培养了重要的翻译人才。明朝还有同样涉及外事活动的会同馆，会同馆隶属于兵部，主要负责诸国朝贡使团的接伴送迎并为其提供居留之所。当然，接伴使者必然需要翻译，所以在明代会同馆所辖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罗、满刺加、百夷、西番、回回、高昌、鞑靼、女真等十三馆之中也不乏熟悉这些语言的通事。此外，十三馆之外还有精通真腊（今柬埔寨境内）、爪哇、苏门答腊、缅甸、河西等言语的通事。为了便于各馆通事学习诸国语言，明代会同馆也编写了一些用汉字对音的番语词汇集，主要是用于口语通译。^①

1644年清军入关，然后逐步统一中国，由于满清贵族毕竟是少数，广大汉族人民不识满字，于是清朝设有“笔贴士”一职，即翻译缮写满汉文的低级官吏，从中央机构到地方衙门以及都统等衙内均配有多名笔贴士。当时，满清政府也十分重视各族语言的教学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学（京师官学、地方官学），学习满文、蒙文、汉文等。学成之后，经选拔可以到部、院、地方衙署供职，其中有的就成为了笔贴士

^① 刘红军、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48—49页。



及口译人员。而且,清朝的科举考试中还特设翻译一科,主要考查考生的满文与汉文、蒙文之间的翻译。康熙皇帝在与俄国谈判《尼布楚条约》时就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和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同时,清朝保留了明朝的“四夷馆”,只不过更名为“四译馆”。雍正年间,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门学习拉丁文,其中的教材《华夷译语》本来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竟逐渐收录其他语种,成为中国近代初期外译汉的官方辞书。自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随着中国亟待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从而制造出自己的坚兵利炮,清政府开始着手改革教育,其中,为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奕訢等于1860年(一说为1861年)奏请设立同文馆,他们认为:

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办,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飭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①

到1862年,同文馆拥有雏形,1868年正式成立(一说1869年)。开始时只有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和俄文馆,1872年增设德文馆,1896年又增设东(日)文馆。学习翻译是同文馆学员的主要课程和活动,因此总教习丁韪良筹建了翻译馆,凡是在译书方面有成就者,便给予奖励。同文馆师生所译之书据说有二百余种。^②同文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所外语学校,学制为8年,学生不仅学习外语,还学习中国语文、

^① 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39页。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课程，同时还有较多的翻译实践机会，包括笔译和随同外交使节出国担任口译、接待外宾等机会。同文馆的整个存续期间，师生承担了外事电报和文件的翻译，其毕业生根据成绩分配到外交机关、电报局、邮政局、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等部门担任要职。总之，同文馆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和科技人才，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语教学、翻译教学以及翻译活动等作出了贡献。

无独有偶，1863年（同治二年），李鸿章以上海、广州两口岸交涉事件较多为由，奏请在上海成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即广方言馆，考选江浙一带十四岁以下文童及年轻小官吏入馆学习，聘请英国人为西教习、中国人担任总教习和分教习。课程有外国语言文字、近代自然科学和儒学，学习期限为三年，毕业后视成绩分赴各衙门、海关担任翻译等洋务工作。该馆存在了四十二年，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翻译课程，与外文教习合作译书，毕业后从事教育、笔译的人也翻译了不少西书。但总体来说，广方言馆和同文馆所培养的学生后来更多地进入了外交界，担任驻外公使、参赞和翻译官等。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效仿上海广方言馆之例，经奏请后在广州设立了方言馆，所招收的学生在14到20岁之间，及第者分受本省衙署译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洋务派中具有维新思想的语言学家马建忠提倡设立翻译书院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同时还提出要有计划地翻译图书，强调翻译书院必须以教、学、译和出书相结合。他指出：

……夫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类又皆驳杂迂讹，而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足当译书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则译书之不容少缓，而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也，不待言矣。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江游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



小学，而字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辣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正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派，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前者郭侍郎出使，随往英法，暇时因举曩所习者，在法国考院与考其文字、格致两科，而幸获焉；又进与考律师之选，政治之选，出使之选，亦皆获焉。曾拟将诸国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异，以及教养之道，制用之经，货财敛散之故，译为一书，而为事拘牵，志为得遂。近复为世诟忌，摈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旧业。今也倭氛不静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右，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左；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①

在当时中国处于“倭氛不静而外御无策”之时，马建忠看到了译书的重要性，坚信设立翻译书院、翻译西方著作能够拯救国家危亡。且看“外患方兴，内訌洊至，东南沦陷”和“今也倭氛不静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马建忠拳拳的爱国之情。总的来说，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过译介西方的科技文献，发展中国的工业，制造出坚船利炮，把中国从西方列强的牵制下解救出来，其主要动机是富国强兵。虽然马建忠的这一建议未得到当时清廷的采纳，但是其中蕴含的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相结合、翻译人才的培养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想极具前瞻性，对当今

^①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6—127页。

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各种文学社团，包括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也为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尤其是这些社团的外国文学翻译带动了一大批翻译的新生力量。比如，成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翻译文学史上重要的团体之一。该研究会在成立的初期以译介外国文学为重要人物，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从事翻译，更多的时候以翻译为主，创作为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会特别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联合了数以百计的翻译工作者，培养了一大批新的力量。”^①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文学研究会不仅是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团体，还是培养文学翻译人才的重要场所。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翻译教学悠久的历史传统，上述翻译教学机构和翻译人才培养机构为中国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国与外国之间口头交往和书面交流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从而促进了中外以及国内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友好往来，也为后来的翻译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更彰显出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教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二）从翻译在历史上的作用看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翻译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季羨林先生就曾经高度评价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的作用。他认为中华文化这条长河就得益于有新水注入，最大的两次分别是印度来的水和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水的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因此，季羨林先生将翻译视为中华文化长青的“万应灵药”。

始于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翻译，带来了佛教文化与中国儒道文化的融合，丰富了中国固有的文化，

^①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包括词汇、绘画、音乐、建筑、雕塑、观念等。具体说来,从汉朝到唐朝,由翻译产生的词共有 35000 多个,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佛经传到中土的结果,因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翻译活动就是佛典的翻译;佛经翻译不可能总是四言八句的工整对仗,所以打破了中国原来的文风,对我国语言从文言走向白话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中国文学和文论也都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如“境界”一说,同时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的题材源于佛典文献或者受到佛经的影响,如《红楼梦》的开头、《西游记》以及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某些内容和情节等;佛典翻译还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带来儒、释、道三家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朝代、不同阶段的统治者对待三家思想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都旨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另外,佛经的诵咏丰富了中国音乐艺术,佛典的翻译带动了佛典的传播,从而带动了佛塔的建设和石窟艺术的发展,不能不说中国的建筑艺术中有很多佛教艺术的烙印。^①同时,佛典的翻译中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对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佛典翻译的初期,译者采取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策略,包括对“以人为本”观念、“孝尊”观念、“两性关系”、“社会等级秩序”等的屈从适应。^②这是“由于中国民族在摄取佛教以前已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的缘故。”^③尤其是隋唐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新传入的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已和儒教伦理联系和妥协。”^④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思想通过翻译产生相互联系和影响,这种互动对两种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和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知识分子与耶稣会士的合作翻译西方自然科学

① 彭萍:《翻译伦理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 页。

② 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2 期,第 26—34 页;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1—161 页。

③ 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2 期,第 33 页。

④ 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2 期,第 33 页。

著作促进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知识分子首创了中西合作翻译西方科技文献的实践，引进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西方科技著作。同时利玛窦第一个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启了将中国典籍译介到西方的先河，利玛窦还是第一位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的西方人，还与另一位传教士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词典》。尤其是在天文学和几何学等方面，这一时期的翻译功不可没。正如梁启超指出：

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经屡次辩争的结果，足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那班人的译著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魏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①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此处的徐文定就是徐光启，李凉庵即李之藻，“利、庞、熊”分别为传教士利玛窦（Matthaeus Ricci）、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



洋务运动时期，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洋务派主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所以这一时期的汉译文献主要是一些科技文献，主要涉及兵政、医学、工政、历史、算学等方面，“为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新的教学内容，同时也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军工民用企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①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是徐寿、李善兰等，他们与西方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和地质学、医学、兵学和兵制、工商业、政治、历史和交涉等诸多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新词，丰富了汉语的科技词汇，便于后代学习。例如，在翻译中定夺数学（几何和代数）、力学、植物学、化学等术语时都本着能够让中国读者一看就能明白并且容易记忆的翻译原则，采用了非常形象的造词法和造字法翻译各个学科的术语，如几何中的“锐角”、“钝角”、“直线”、“斜线”等，代数中的“系数”、“函数”、“常数”等，力学中的“分力”、“合力”等，化学元素名称“锰”、“镁”、“养气”、“轻气”等，还有“植物学”、“细胞”等。这些科学名词大多都沿用至今。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更是一种文化热潮，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引入西方文化以改良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翻译涉及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经济、法律、哲学、逻辑、文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如严复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法学、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林纾与他人合作首次译介了西洋小说，为开启民智和启蒙当时的国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一部分从西洋和日本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的西洋作品和日本作品，尤其是小说，以此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科学技术以及教育体制等等，旨在开启民智，改造社会。随着救亡图存的浪潮不断高涨，各种形式的小说被译介到中国，如政治

^① 潘玉田，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